

人类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转折点(下) ◆ 阿尔·戈尔

危险并不止于名单上的国家。每一次出现非常不寻常的潮汐时,都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世界都会有更多城市受到威胁。在那些受威胁最大的城市,保险公司表示相当大区域都已经不再获得承保。在海拔低的太平洋国家,比如基里巴斯,开始到别国购买土地,为安置其难民做打算;印度因此在边境线上修建坚固的隔离墙,阻止孟加拉的移民涌入印度。

另外,气候变化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

碳排放的成本有多种,包括野火、洪水、山体滑坡、干旱、基础设施的损坏、气候难民、政局不稳、海平面的上升、疾病等等,它不仅对人类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生物产生影响。在过去的四五十年,我们失去了这个星球上一半以上的生物,将来还会再失去50%的物种。物种的灭绝将是无法逆转的。

要想阻止这种趋势,必须要改变,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改变。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

我们这一代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人类历史上,一些文明做了错误的选择,结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一代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4年11月初公布了最终报告: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

造成严重、顽固和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首先是要针对化石燃料的无限制使用。打个比方,直到发生了危机,所有人都认为次贷有很高的价值,但当有一天大家仔细打量一下,发现次贷不值钱了,立刻就引发了美国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直到今天全球还在挣扎,还在恢复。化石燃料和次贷有相似性,如果燃烧过分,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变得一文不值。

因此,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四年前,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对化石能源的投资,美国出现了页岩气革命,带来了页岩气的开发和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转向低碳经济,并带来上亿个就业机会。

巴菲特,美国最成功的投资者,已经准备好加倍对功能和太阳能进行投资,投资额达150亿美元。绿色债券在过去十年发行量增加了10倍。

2000年的预测认为,到2010年美国的风电产能达到300亿瓦特,现在美国的风电产能是其10倍;中国现在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端。现在全球有650万人从事于从安装、维修到运营等各种风能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

12年前,预测在10年内太阳能市场将每年增加10亿瓦特,现在的太阳能市场已经是这个目标的17倍。光伏开始像平板电脑一样,产量和安装量都在迅猛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急剧下降,当成本下降到低于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对手,转折点就出现了。



在中国,有预测认为到2015年-2016年间,太阳能的成本将会低于煤炭的价格。

为什么当年的预测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有四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成本快速下降;第二,质量大幅提升;第三,购买决策由个人作出,而非公用事业公司;第四,没有陆线电网的国家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贫穷国家可以在小城镇直接安装光伏电池,由此实现跳跃式的飞跃。分期付款制也让光伏更可负担,一位印度妇女不愿接受一个月花费35卢比安装太阳能,但如果让她一天付出一个卢比,就是能够接受的。在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孩子们实现了通过太阳能上网。

中国在这方面也创了纪录。2014年二季度,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达到了193亿美元,带来几百万就业机会。

在德国,2014年已经实现了74%的电力来自风能。在澳大利亚,

已经不再新装热电厂,因为太阳能已经让电力价格大幅下降,热电厂变得不再划算。现在每小时到达地球太阳能足以满足世界一整年的电力需求。

尽管可再生能源市场如此繁荣,我们仍需要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到2025年达到峰值。

这需要对碳进行定价,这也是我希望美国能够填补的一项政策空白。美国的经济体系对很多东西是征税的,但有些商品却被忽略了,这不符合经济学,也不是好的治理。补救方法就是对碳定价,碳税可以返还给人民,为人民创造福利,或者可以减轻其他方面的税收,例如公司税。

此外还应建立起开放的贸易制度,应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污染征税,利用市场形成联盟来解决未来文明的问题。

美国与中国在2014年末的时候达成了碳排放协议,两国将在达

成国际气候协议方面进行合作。这创造了巨大的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展示了全球领导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一直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潮流,中国企业一直都被要求要报告它们的碳排放量,有遍布全国的34个城市做出了相应的碳排放保证。在美国,我们在持续关闭燃煤厂,有40万人在做着相关的努力。

虽然现在各国所做出的努力还不足以达到化石燃料消耗量在2025年到达峰值的目标,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起点,当我们开始以正确的方式行动起来,就会带来能量。

正如指数的增长曲线刚开始是缓慢的,之后就进入增速很快的阶段,政治行动通常也会呈现同样的方式。我认为当中国和美国在采取行动,其他其他国家也会效仿,欧洲已经在这样做了。

我记得在我13岁的时候,当时的肯尼迪总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他宣布要在十年内实行登月计划。我听到成年人批评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做不到,而且花费巨大。但是八年又两个月以后,阿波罗号成功登月了,登月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欢呼声。

我希望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人也欢迎挑战,未来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需要创造的。

想象一下我们下一代人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混乱,政治不稳定,有数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有很多难民,还有频繁的洪水爆发与山体滑坡。那时他们会诘问我们,你们当时在考虑什么?为什么你们当时不采取措施?

摘自《财经》微信公众号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15.让敌人空欢喜一场

留在东路的“江阴老虎”52团,在时任18旅旅长江渭清的指挥下,配合地方武装和党政组织,在苏常太进行了极其艰苦而英勇的40天坚持。该团在攻克苏州附近的黄埭、横扫太湖地区全部敌伪据点的同时,不断探索完善“以分区转移对付敌分区‘清乡’”的新战法,坚持以分散对付集中,以集中对付分散,避其锋芒,击其空隙,积小胜为大胜。敌人行军纵队侧后,经常会遭到三三两两出没无常的便衣武装袭击。敌人刚刚驻扎,忽地冷枪四起,于是,敌哨兵倒下了,军马被打倒了,弹药库起火了,手榴弹扔进房屋爆炸了,使敌白天疲于奔命,夜晚不得安宁。一次,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经一天“扫荡”,龟缩于周泾巷。52团分析敌骑不善夜战,料定他们宿营后必然是当官的酗酒作乐,当兵的喂马做饭,疏于防范。经侦察,住在街中心祠堂和几间大屋里的敌人果然毫无戒备。52团2营组成两个突击队,分头向街东、北两端隐蔽接近。拂晓前,以两颗手榴弹爆炸为信号,突击队随即从两端冲入。霎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中弹和受惊的军马嘶叫着挣断缰绳,满街乱窜。穿着白衬衣的日军冲出大门,哇哇乱叫着在军马中左冲右撞。2营机枪手对准日军人马猛烈扫射,打得日军人仰马翻。

7月27日,新四军6师18旅52团攻克苏州西郊伪军据点寺桥镇,全歼伪3师一个连。不久,52团又组织了常熟东山头战斗。清晨日军突然来袭时,1连连长吴一民奉命带领全连抢占东山头阻击敌人。每人只有5发子弹和2颗手榴弹的1连官兵占领有利地形后先敌开火,打得装备精良的上百名日军尸横遍野。激战3小时后,全连官兵子弹打光,连长把全连仅剩的38颗手榴弹交给1排长,命令他带领全排绕到敌后,全连前后两面夹击敌人。接着,吴一民一马当先带领其余官兵扑向敌人,展开气壮山河的白刃格斗。战斗最残酷的时候,1排从后面对敌人展开勇猛攻



击,日军在腹背受敌中整体崩溃,1连官兵用大刀砍、刺刀捅,全歼上百名日军。

刘飞率53团跳到外线后,在长达10个月的东路地区反日伪“清乡”斗争中,实行机动灵活的作战,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组织和保护民兵及抗日群众有计划地破坏道路,大面积烧毁竹篱笆,使敌人在“清乡”中始终未在东路搞成完整的篱笆封锁线。

“忠义救国军”澄虞挺进纵队郭墨涛部,会同白汉生部与恬庄伪军头目杨春华沆瀣一气,三股伪军集结于祝塘,于8月3日公然向新四军6师进犯。当时,18旅52团已经渡江北上,6师师部和18旅旅部率53团、54团各1个营进行反击,激战一天毙伤伪顽军80余人,53团营教导员商健民在组织部队反击时头部中弹牺牲。“忠义救国军”从商健民衣袋里搜出一枚刻有“夏光”二字的牛角印章,遂残忍地将商健民首级割下,装进笼子悬挂在祝塘镇围墙上示众,并对上邀功请赏。汪精卫的《国民新闻》很快发表了“匪首夏光中弹毙命已证实”的消息。

“夏光牺牲了?”陈毅拿着敌伪报纸,疑惑地问谭震林。谭震林笑而作答:“夏光的参谋长不是谭得好好吗?”原来,战士们将战斗中缴获的一枚伪军军官的名章刻上夏光的名字送给他,不久名章被戴克林拿走,后又被商健民获得,未及磨去名字,遂让好大喜功的“忠义救国军”空欢喜一场。

1941年9月16日,先后给刘飞、夏光 and 何克希当过警卫员的54团1营1连连长何彭福(后改名何云),带领全连官兵,在团长吴咏湘和西路保安司令韦永义统一指挥下,会同51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武进县荫沙镇包围了前来抢劫的伪水警大队。何彭福凭借由首长那里学来的战术,指挥部队先敌一步抢占了两米多高的围堤这一有利地形,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营长带3连赶来增援后,何彭福组织两个排向敌正面发起攻击,3连从左侧发起反击,2连已在长江边上断敌退路。51团和民兵大队围捕溃散的伪水警,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活捉伪水警大队大队长,缴获3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

27.万商云集

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角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频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商帮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上海商业繁荣,也带动了商帮发源地或主要活动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早先声名显赫的“徽商”“晋商”这些商人群体以外,在来沪的客籍商帮中,洞庭商帮、浙江宁绍帮、关山货帮、钱庄以及闽广帮、江西帮等地方商帮的势力日益壮大,乾隆以后,这些客籍商帮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洞庭商帮多开行铺,其中不少人落籍定居;浙帮商人以浙东宁波、绍兴居多,绍帮以经营炭棧、钱庄、酒坊为主;宁帮经营范围更广,举凡海船运输、南北货贩运、钱庄、银楼、糖业、绸缎业、棉布、药材、海鲜、咸货业,无不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于是宁帮商人成为上海徽商、秦晋商人之后最有势力的客籍商帮。此外,如山东商人又分西帮、胶股、登帮、文莱帮和诸城帮,合称北五帮商人。江北帮商人指的是海门、通州一带的船商及海州赣榆县的青口商人,通州北帮商开埠前夕仅次于本帮沙船主,通州、海门两帮各有数百号商船,常年聚于上海,或自载商货,或为客商载运;闽广商人可分泉漳帮、潮州帮、建汀帮、揭普丰帮和潮惠帮等帮口,是海禁开通以后随着沿海埠际贸易的兴盛而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商业势力,主要从事海船运输和南北货贩运;江西商人在上海起步较晚,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贩运业,即将江西内地的茶叶、瓷器、棕、苎麻等贩至上海,然后再贩棉布及杂货回内地。除了这些商帮外,开埠前上海地区的客籍商贾还有来自汉口、江宁、镇江、无锡等地的商人。

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

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活力。而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万商云集”在上海的聚合效应为上海文化铺上了底色,加之柔婉细腻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深深地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在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五方杂处”的特有风貌,充分说明了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上海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文化结合,并且成功地将外来因素与自身特点结合,从而造就了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一朵奇葩。

商业文化的底色,规定了交易就要公平合理,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总是难以持久和不得人心的。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与文化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上海人最先把商业范围内的职业称作“饭碗头”,把工作作用的工具也称之为“吃饭家伙”,“有饭大家吃”,就是提倡生意一起做,共生共赢。

上海人群体之中的精神气质又表现出精明而不失厚道。厚道,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一份可贵的温馨。厚道之人,往往是低调内敛之人,他们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一如山中的清泉,以其清纯的本色而为人称道。厚道,也是打造理性社会、秩序社会、诚信社会的道德基础,有时更需要人们的奉献,甚至是必要的牺牲。

上海人对那些“花架子”、“撒泼头”式的东西不感兴趣,崇尚认认真真做事的能力。做什么事情都会谨慎小心,精密规划,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个明明白白,是决不会轻易出手去做的,诚如许多朋友所说的,给一点空间,给一些政策,就能还给你一个创意,一份出乎意外的惊喜,这就是上海人崇尚实际和能力的体现。

醉上海

仲富兰

